

红旗

HONG QI

21-22

一九六四年



红旗

半月刊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

★ 一九六四年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 ★

目 录

社論：**赫魯曉夫是怎样下台的** …………… (1)

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許建国 (9)

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

——評馮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陆 鋒 (13)

通
訊

过渡时期没有阶级斗争吗?……………洗光位 (25)

敌我矛盾不容调和……………俞建平 (29)

英雄事迹从哪里来?……………李小林 (33)

駁“和平转变”論……………陈瑞苗 (35)

西方基督教神学是怎样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楊 真 (38)

☆ 十一月二十一日出版 ☆



—社 论—

赫魯曉夫是怎样下台的

赫魯曉夫下台了。

这个窃据了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地位的大阴谋家、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号代表，终于被赶出历史舞台了。

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件对世界人民革命事业有利的大好事。

赫魯曉夫的垮台，是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伟大胜利，表明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大破产，大失败。

赫魯曉夫究竟是怎样下台的？为什么他混不下去了？

关于这个问题，在全世界各种政治力量中间，引起了这样或那样的议论。

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以及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中间，无论是同情赫魯曉夫的，或者是同赫魯曉夫有利害冲突的，都对于这个似乎“强有力的人物”的突然垮台，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看法。



很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对于赫鲁晓夫的下台问题，也发表了文章和文件，公开说明自己的意见。

现在，我们在这篇文章中，也来谈谈赫鲁晓夫怎样下台的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赫鲁晓夫的下台，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而且可以说，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早就预见到赫鲁晓夫的这个下场。

人们尽可以列举千百条罪状来说明赫鲁晓夫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他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是石头，就得搬开。不管赫鲁晓夫之流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民总是要把他抛弃的。赫鲁晓夫的下台，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种历史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但是，赫鲁晓夫这个当代政治舞台上的丑角偏偏要倒行逆施，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为垂死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延长寿命。

赫鲁晓夫搜罗了历来所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拼凑了一整套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路线。他对帝国主义实行投降主义，用阶级调和论来取消和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实



行分裂主义，用大国沙文主义来代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在国内极力瓦解无产阶级专政，企图用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来替换社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

十一年来，赫鲁晓夫利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违背苏联人民的真正愿望，做尽了他所能做到的一切坏事。总起来说，有以下这些：

一、他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用最恶毒的语句大肆辱骂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领袖斯大林。他反对斯大林，就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一笔勾销苏联人民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的整个时期的伟大成就，以此来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伟大的苏联，丑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赫鲁晓夫这种作法，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苏反共的活动提供了最肮脏的武器。

二、他公然违背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追求同美帝国主义实行“全面的合作”，荒谬地主张苏美两国首脑“决定人类命运”，一直吹捧美帝国主义的头子“真诚地希望和平”。他一忽儿实行冒险主义，把导弹运到古巴，一忽儿实行投降主义，俯首贴耳地按照美国强盗的命令，从古巴撤走导弹和轰炸机，接受美国舰队的检查，甚至背着古巴政府，企图出卖古巴的国家主权，答应由美国操纵的联合国派人到古巴国内去“视察”。赫鲁晓夫这种作法，使伟大的苏联人民遭受到十月革命四十多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

三、他为了迎合美帝国主义推行核讹诈政策的需要，阻止社会主义的中国建立自己的核自卫力量，不惜损害苏联本国的国防力量，串通美、英两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所谓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事实证明，这个条约是一个大骗局。赫鲁晓夫签订这个条约，是丧心病狂地出卖苏联人民的利益，出卖社会主义各国人民的利益，出卖爱好和平的全世界人



民的利益。

四、他在所谓“和平过渡”的名义下，百般阻挠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革命运动，要求他们走所谓合法的“议会道路”。这条错误路线，麻痹无产阶级的革命意志，瓦解革命人民的思想武装，使一些国家的革命事业遭受严重的挫折。这条错误路线，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变成毫无生气的新式社会民主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的驯服工具。

五、他在“和平共处”的幌子下，竭力反对和破坏民族解放运动，甚至伙同美帝国主义一起镇压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他指使苏联驻联合国的代表投票赞成派遣侵略军帮助美帝国主义镇压刚果人民，并且用苏联的运输工具把所谓“联合国军”运进刚果；他实际上反对阿尔及利亚人民的革命斗争，把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斗争说成是法国的“内政”；他对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制造的北部湾事件，竟采取“超然”的态度，煞费苦心地为美国挑衅者解围，替侵略强盗开脱罪责。

六、他公然违背一九六〇年声明，不遗余力地替叛徒铁托集团翻案，把已经堕落成为美帝国主义走狗的铁托说成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已经蜕化成为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他反复宣称他同铁托集团“属于同一个思想，以同一个理论为指南”，表示要向这个出卖南斯拉夫人民利益、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叛徒虚心学习。

七、他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阿尔巴尼亚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想尽方法打击它，破坏它，恨不得把它一口吞掉。他悍然断绝同阿尔巴尼亚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外交关系，专横地剥夺阿尔巴尼亚在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中作为成员国的正当权利，并且公开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八、他极端仇视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



党，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他推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大障碍。他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任意造谣诬蔑，同时采取种种卑鄙恶劣的手段，妄图颠覆社会主义的中国。他背信弃义地撕毁了几百个协定和合同，擅自撤走了数以千计的苏联专家。他在两国边境上制造纠纷，甚至在新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颠覆活动。他还支持印度反动派对社会主义的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同美国一起，用军事援助，去鼓励和帮助印度反动派向中国进行军事挑衅。

九、他公然破坏兄弟国家相互关系的准则，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他任意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他在所谓“经济互助”的名义下，反对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经济，强使兄弟国家变成原料供应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要使兄弟国家的工业部门变成附属工业。他夸耀这一套是赫鲁晓夫自己的理论和学说，实际上是把资本主义世界弱肉强食的原则，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把垄断资本集团搞的“共同市场”，作为自己效法的榜样。

十、他彻底破坏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采取种种阴谋手段，任意对兄弟党进行颠覆和破坏活动。他不仅在自己的党中央委员会、党代表大会和一些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对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放肆发动大规模的公开攻击，而且在许多兄弟党内，公然收买蜕化变质分子、叛徒、变节者来支持他的修正主义路线，打击以至非法开除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不顾一切地制造分裂。

十一、他肆意破坏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准则，以老子党自居，一意孤行地决定召开非法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他在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的通知信中，下命令要在今年十二月十五日就召开所谓二十六党起草委员会，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十二、他为了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适应国内资本主义势力的需



要，实行了一系列向资本主义倒退的修正主义政策。他在所谓“全民国家”的幌子下取消无产阶级专政；在所谓“全民党”的幌子下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原则，把党分割成所谓“工业党”和“农业党”。他在所谓“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千方百计地要把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用血汗创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拉回到资本主义的旧轨道上去。他对苏联农业和工业的瞎指挥，使苏联的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给苏联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困难。

十一年来，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处处都说明了他所执行的政策，是：联合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联合美国，反对中国；联合各国反动派，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联合铁托集团和形形色色的叛徒，反对一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兄弟党和一切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革命派。赫鲁晓夫的这一切政策，根本危害了苏联人民的利益，危害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利益。

以上这些，就是赫鲁晓夫的所谓“功绩”。

像赫鲁晓夫这样的一个人物之所以垮台，绝不是由于什么年迈和健康恶化，也不只是由于他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的错误，而正是由于他推行修正主义总路线和对内对外的一系列错误政策的结果。

赫鲁晓夫根本不把人民群众放在眼里，他总以为苏联人民的命运可以听凭他随便摆布，各国人民的命运可以由苏美两个大国的“首脑”任意主宰。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不过是傻瓜，而他自己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他妄图强使苏联人民和各国人民匍匐在他的修正主义指挥棒下。这样，他就完全把自己放在同苏联人民，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同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为敌的地位，使自己走进了众叛亲离、内外交困的死胡同。他拿起绞索套上自己的脖子，这就叫做自掘坟墓。



历史上曾經出現过不少妄想扭轉历史潮流的丑角，但是，这些丑角没有一个不是以身敗名裂而告終。无数的事例证明，凡是不顾社会发展的历史要求，违抗人民意志而胡作非为的人，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英雄人物”，也不管他是多么驕橫跋扈，其最后的結果，只能是变成一个滑稽可笑、一錢不值的人物。以損人的目的开始，以害己的下場結束，这就是他們的共同規律。

第一国际时期的“人物”如巴枯宁之流，曾經是囂張一时的反馬克思主义的“英雄”，但是，为时不久就被人們拋进了历史的垃圾箱。第二国际时期反馬克思主义的“好汉”伯恩斯坦和考茨基，曾經是霸占了国际領導地位的“龐然大物”，可是，到头来只落得一个遺臭万年的叛徒称号載入史册。列宁逝世以后，反对派的头目托洛茨基曾經把自己装扮成好像是一个什么“英雄”，但是，事实证明斯大林說得很对：“与其說他像个英雄，不如說像个戏子，把戏子和英雄混为一談，无论如何是不行的”。

“人間正道是滄桑”。历史教訓告訴我們，誰妄图阻擋历史車輪的前进，誰就要被压得粉身碎骨。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反复指出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紙老虎，修正主义者也是紙老虎。那些代表反动阶级、反动势力的“英雄好汉”們，尽管张牙舞爪，不可一世，实际上不过是貌似强大的紙老虎，是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不要多长时间，他們就会被历史的巨浪所淹沒。赫魯曉夫并不例外。想当年，他在苏共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大反斯大林、大反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对坚持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襲击的时候，气焰何等囂張。但是，曾几何时，这个反苏、反共、反华的“英雄”，就步了他的修正主义前輩的后尘。不管人們曾經怎样劝說过他，要他浪子回头，但是，他毫不理会，終究把自己推上了絕路。



赫魯曉夫垮台了，他处心积虑地推行的那一套修正主义路綫也破产了，而馬克思列宁主义仍将不断战胜修正主义思潮，繼續向前发展；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也仍将不断扫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繼續向前发展。

当然，历史的道路依然是曲折的。赫魯曉夫虽然垮了台，但是他的支持者美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分子并没有死心。这些牛鬼蛇神仍在念念有詞地为赫魯曉夫“招魂”，到处宣揚赫魯曉夫的所謂“貢獻”和“功績”，希望事情依然按照赫魯曉夫所規定的路綫繼續做下去，实行所謂“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义”。可以断言，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各式各样的代表人物，各式各样的思潮，总是想登台表演一番。各人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完全可以由他們自己去选择。但是，有一点是我們深信不疑的：历史必将按照馬克思列宁主义所揭示的規律前进，必将按照十月革命的道路前进。具有革命传统的伟大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一定能够为保卫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为保卫列宁所締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崇高威望，为保卫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純洁性，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作出新的貢獻。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阿尔巴尼亚在社会主义大道上前进

——庆祝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

許 建 国

今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是英雄的“山鹰之国”——阿尔巴尼亚解放二十周年纪念
日。在这个光辉的节日里，我们谨向兄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致以最热烈的祝贺和最
真挚的敬意。

二十年前的这一天，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以恩维尔·霍查同志为首的阿
尔巴尼亚共产党（一九四八年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彻底摧毁了意、
德法西斯侵略者和国内封建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赢得了真正的民族独立，建立了
人民政权，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从此，阿尔巴尼亚人民意气昂扬地跨进了
一个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崭新的历史时代。

二十年来，勤劳勇敢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领导下，不仅
很快医治了惨重的战争创伤，而且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恢复和发展了国民经济，
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两年计划和两个五年计划，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伟大胜利。

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到一九六〇年，在全部
国民收入中，社会主义经济所提供的部分已占百分之九十左右；社会主义工业的产
量，已占工业总产量的百分之九十九；批发商业已全部成为社会主义商业。到一九
六三年，农业合作社的播种面积已占全国农户播种总面积的百分之八十七。

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人民已经把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具有现代技术
水平的农业——工业国。过去，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工业，一切都有赖于从国外进



口，而現在，全国已經建立了許多新的工业部門、新的工厂和矿山。一九六三年的工业总产值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二十九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現在，阿尔巴尼亚工业十三天的产量，就相当于一九三八年全年的产量。

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的农业生产，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到一九六三年，全国耕地面积比一九三八年扩大了百分之六十八，大片的沼泽地带已經变成良田沃壤，許多的荒山秃岭已經变成果园丛林。一九六三年，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一点四倍，灌溉面积增长了五倍，机械牵引力在全部农业牵引力中所占的比重，也从一九三八年的百分之零点八增长到百分之八十四。今年小麦又获得丰收，总产量比去年增加了一倍。

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飞跃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已經基本上消灭了文盲，确立了七年制义务教育，并且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自己的高等学校。現在，全国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人在校学习，所有的劳动人民都能享受到丰富的文化生活。

二十年来，随着工农业生产的不断提高，阿尔巴尼亚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改善。一九六三年的国民收入比一九三八年增长了四倍。現在，全国已完全消灭了饥饿和失业，广泛地实行了免费治疗。解放以来，前后十次降低物价，使劳动人民受益达八十七亿四千多万列克。

二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是，英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却用辛勤忘我的劳动，使自己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建設成为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目前，阿尔巴尼亚人民正在以自己的創造性劳动，为胜利实现第三个五年計劃而繼續奋斗。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革命和建設中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正确領導的結果。二十年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根据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則和本国的革命实践，制訂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針政策，领导阿尔巴尼亚人民战胜了无数的艰难险阻，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阿尔巴尼亚的这些成就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解放前，阿尔巴尼亚的經濟情况是比較落后的，加上几年的战争，使国民經济遭到巨大的破坏。解放后，



美帝国主义和叛徒铁托集团又千方百计地对阿尔巴尼亚进行封锁、破坏和颠覆，妄图把它拉回到被侵略被奴役的老路上去。近几年，现代修正主义的头子赫鲁晓夫粗暴地撕毁了过去同阿尔巴尼亚所签订的全部协定，断绝了全部贷款，企图扼杀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这一切，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建设遭到更加严重的困难。

但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阿尔巴尼亚人民，不畏强暴，不怕艰险，“宁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坚持原则，坚持斗争，终于战胜了一切困难。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一个又一个宏伟的建设计划，并且锻炼和培养了自己的技术专家，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恩维尔·霍查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双腿——工业和农业——前进的。所以，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的状况和发展。”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用大规模的集体所有制代替农民狭小的个体所有制，作为在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的途径。解放以后，党就积极领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到一九五九年，全国已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从而为农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重视对人民群众进行无产阶级的阶级教育，以促进经济建设的发展。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今年七月中央全会上指出：“我们已经粉碎了阶级敌人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消灭了城市和农村的剥削阶级。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在我们这里阶级斗争已经结束，阶级斗争的土壤已经不存在了。改变了的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在我们这里，无论是在经济领域内，还是在政治思想领域内，都有阶级斗争的表现。”

阿尔巴尼亚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树立了一个艰苦奋斗的光辉榜样。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一贯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外政策。它始终不渝地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列，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战斗旗帜，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积极支持西欧、北



美各国劳动人民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斗争。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影响日益扩大，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它是反对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一支重要的、坚强的力量。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坚持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解放二十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愧为英雄的党，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不愧为英雄的国家，阿尔巴尼亚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因为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尔巴尼亚人民作为自己的亲密战友而感到自豪。

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虽然在地理上相隔万水千山，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共同理想却把我们两国人民紧密地联在一起，结成了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正如霍查同志说的，“伟大的阿中友谊是纯洁的、深厚的和不朽的友谊，因为它是建筑在具有生命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基础上的，是在争取自由、社会主义、和平的斗争中，在反对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建立和锤炼出来的”。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动摇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伟大友谊和战斗团结。

中国人民永远是阿尔巴尼亚人民最忠实、最可靠的朋友。我们两党和两国人民从来都是互相学习、互相鼓舞、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这一战斗的革命友谊，已经经受了大风大浪的考验，它正发出越来越灿烂的光辉。

在今后的日子里，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出现什么情况，中国人民将永远和阿尔巴尼亚人民站在一起。我们两国人民将永远并肩携手，为反对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而斗争，为促进全世界人民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社会主义的事业而斗争。



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

——評馮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

陆 鋒

《平凡的真理》先后刊印过六种版本，这六版的变化趋向是一版不如一版，越变越坏。这种趋向很耐人寻味，希望大家一起来討論研究。我們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同志們，最近集中力量研究了这本书，这里所評的是最新的版本，即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九年第二版、一九六〇年一月北京第十次印刷的。

这本书是馮定同志的代表作。它以广大青年为对象，但全书充滿了严重的錯誤，是一本毒害青年的坏书。作者故意标新立异，对他自己根本不懂的一些自然科学、心理学材料，胡乱抄引，妄加解释，弄出了許多笑话；在語言上，为了掩飾自己的錯誤，也有意說得模稜两可，似是而非，而且像魯迅所痛斥过的那樣，生造了許多“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类”。但是，不管作者怎样伪装，也掩盖不了这本书反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它挂着馬

克思主义的招牌，販卖资产阶级的反动货色；并且，跟在現代修正主义集团的屁股后面，积极地推銷修正主义的謬論。因此，清除这本书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就成了一项必要的工作。

任何哲学都表現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归根到底，都是不同阶级政治方向的表现。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最科学最正确的宇宙观。但是，它与其他任何哲学不同，不把自己虛伪地說成是对各个阶级“一視同仁”的，而是公开声称它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因此，如果有一种哲学，不肯公然申明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那么，不管它为自己貼上了多少馬克思主义的标签，也决不会是馬克思主义的哲学。馮定同志的《平凡的真理》，在我們看来，就属于这种哲学。它名义上是为所謂一般的人类服务的哲学，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哲学。



《平凡的真理》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摆的是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现代修正主义思想。但是，它也有根贯穿始终的主线，这就是以抽象的人为核心，千方百计地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

人有着两重性：一方面人是生物性的；另一方面又是社会性的。但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却不是自然性，而是社会性。人是由猿进化来的，人区别于一切动物以及猿的根本的标志，在于人能制造劳动工具从事生产劳动。生产劳动从来都是社会性的，所以人的本质从一开始，就是由社会性决定的。马克思有句名言：“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这就是说，只有着眼于人的社会性，才能真正理解人的具体本质。

自有阶级以来，只要阶级还未消灭，任何人都不能不是阶级的人。毛泽东同志说：“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②

现代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阶级意识，妄图阻止和延缓革命，故意宣传超阶级的人性和“人类的共同利益”。他们惯用的手法之一，就是把人动物化、自然化。自然性当然无所谓阶级性，因此他们就以人的自然性，来偷换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阶级性。玩了这种抽象把戏之后，似乎抽象的人和人性就确乎存在了。冯定同志的“抽象的人”，也是这样“创

造”出来的。

冯定同志把早已脱离了动物界的人，硬给重新“还原”回去，硬说普通生物的特性也就是人的特性。什么是冯定同志所说的人与普通生物无异的特性呢？那就是“避开对生命不利的东西”，“迎合对生命有利的东西”（第54页）*，概括地说，就是“趋利避害”。他公开地说：“人和其他高等动物一样，为了保持和延续生命，必须争取和迎合有利的事物，拒绝和避开不利的事物”（第66页）。难怪冯定同志把我们革命先烈的“视死如归”的壮举诬蔑成是一时的“冲动”，因为他站在普通生物的立场上，当然无法理解这种高尚革命气概的！

冯定同志之所以把他的代表作命名为《平凡的真理》，并不是出于谦虚，像他所说的因为他“个人是极平凡的；平凡的人写平凡的真理，因而就将这些一条一条的东西叫做‘平凡的真理’”（第4页），而是因为在在他看来，世界上就没有伟大的东西。在他的书里，共所以很难找到“伟大”这个字眼决非偶然。在我们看来，这本书并不是什么“平凡的真理”，而是庸人哲学，伪善者的哲学，法利赛人的哲学。它只讲饮食男女，不讲革命。

①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版，第5页。

②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2版，第871页。

* 以下凡单注页数的都是《平凡的真理》一书的页数。



为了用这套东西去腐蚀青年，作者搜罗了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凑成一本“错误大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外衣下，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了一系列的根本歪曲。下面我们想就一些主要问题，指出馮定同志是怎样歪曲和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是怎样反对毛泽东思想的。

一

由于馮定同志从抽象的人出发，把人看成不过是一种高等动物或“活的机器”，所以他在解释思想、意识的来源时，就很自然地把思想意识归结成为一种单纯的生理过程，从而否定了思想意识的社会根源，反对了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思想。他在《平凡的真理》一书的第一篇中集中论证了他的这种观点，全书的以后各篇也都贯彻了这种观点。他说：“脑子的思维机能，或者是意识活动，归根到底不过是对外来事物‘机械的答应’罢了”（第52页）。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思想、意识除了是外来刺激对人脑所引起的一种生理过程之外，其他什么也不是；当然也就谈不上思想、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

我们并不否认思想意识与神经系统的生理过程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但问题在于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本质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就是人的社会性与阶级性。因此，

人的思想意识从本质上看，只是依赖于社会实践的，而“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①。馮定同志所持的观点的错误，就在于他把人的思想意识仅仅看成生理过程，认为对人的思想意识的研究可以用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去执行。他故意抹杀思想、意识的本质的质的特殊性，否认思想、意识的真正根源是人类社会实践。

馮定同志为什么在今天要大力宣扬这种错误的思想呢？这的确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

馮定同志既然把思想、意识还原为生理过程，抹杀了思想、意识的社会性与阶级性，他这种观点也就很自然地成了在思想领域内取消阶级斗争的一种方便的武器。下面且举几个例子，说明一下馮定同志是怎样运用这一思想武器来达到这种反动目的的。

在谈到爱好劳动与好逸恶劳两种思想意识的根源问题时，馮定同志说：“原来人体在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精力是既要补充也要消耗的；这种精力的必须消耗，首先就是人类爱好劳动这个本能的根本，而当劳动还没有完全消耗其应该消耗的精力因而成为余暇时，自必需要娱乐；至于在阶级社会里始终不劳动的人，自必走向荒淫逸乐这样腐化堕落的道路了”（第69—70页）。社会存在决定

^①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72页。



社会意識，爱好劳动和好逸恶劳这两种相反的社会意識本来是不同的社会階級地位所决定的，爱好劳动只是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思想意識，好逸恶劳是剝削階級的階級本性。馮定同志把社会意識的产生归之于生理的原因，是根本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按照馮定同志的观点，既然爱好劳动是由于一切人都具有的在新陳代謝过程中精力必須消耗而产生的一种本能，那么必然得出了全人类不分剝削階級与被剝削階級、反动統治階級与广大劳动群众，都有爱好劳动的思想意識的荒謬結論。这也就是说，我們今天广大劳动人民和干部为了完成党和国家交給自己的任务，而竭尽全力，忘我地工作，并不是出于他們的高度社会主义觉悟，而是由于“精力有余”、“必須消耗”；就剝削階級來說，他們的穷奢极欲，荒淫无耻，也只是由于“精力有余”，“必須消耗”，因而是沒有罪过的。显然，馮定同志的这种观点，一則是為剝削階級的腐化墮落的思想意識作辯護，同时也是对劳动人民的誣蔑。

在思想改造的問題上，馮定同志也有一套錯誤的观点。他說：“条件刺激和条件反射业已成立了和熟练了的时候，如果在仓卒間要由新的刺激来代替旧的刺激，或者相同的刺激而必須予以和旧反射相反的新反射，那么这里的别扭是可想而知的。这也难怪有些人在思想改造中，对于新的道理，往往在思想上虽已暂时接受而在情緒上还是长期抗拒

了”（第98頁）。在这里，馮定同志又把社会現象扯到生理現象上去了。事实上，新旧思想是互相对立的不同階級的思想。一个人如果在情緒上长期抗拒无产阶级思想，根本原因还在于他的非无产階級的思想已經根深蒂固，出于階級的本能而与无产階級的思想为敌。

馮定同志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就是为了要替一些表面上接受思想改造，实际上頑固地站在非无产階級的立場上长期抗拒思想改造的人作辯護。因为按照馮定同志的观点，长期抗拒思想改造既然是新刺激在代替旧刺激时所必然要产生的生理过程，那么，长期抗拒思想改造就是一种“难怪”的現象，是一种值得同情的現象。这也就是说，馮定同志根本否认了我們現在进行的思想改造是階級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馮定同志的这套論調，实际上是要为反对社会主义的思想改造制造理論根据。

从所謂思想意識不过是生理过程的錯誤观点出发，否认思想意識的社会性与階級性，这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决不是个别的現象，而是它的主导思想。例如，他把“长远广大利益和短近狭小利益間的冲突和矛盾”的“不断解决”归结为“感受刺激和进行反射的协调”（第73頁）；把“胜利冲昏头脑”和“利令智昏”两种意义不同的政治情况，统统归结为需要“我們注意調剂兴奋和抑制”（第68頁）；把所謂“好胜逞强”的个人主义思想



归结为“欠缺抑制机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总之，一切社会思想意识，都被他解释成了生理过程，思想意识领域内的阶级斗争也就这样完全被取消了。尽管馮定同志也曾为自己的这种观点打过掩护，说什么“说社会的发展，是因为人要生活；这种用一般的生理因素来说明社会现象，同样是不值一驳的”（第285页）。但事实上馮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却通篇都贯穿了“用一般的生理因素来说明社会现象”的观点。馮定同志的这种观点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本对立的，是和毛泽东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根本对立的。在国内外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今天，馮定同志散布这套论调，企图取消阶级斗争，无疑是十分反动的。

二

在真理和规律的问题上，馮定同志从抽象的人出发，陷入了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

首先馮定同志篡改了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而代之以所谓谋生存的“行动”。他说：“人为了生活，不论是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都必须行动；而且也只有行动中，在改造世界因而争取对己有利而避免对己不利的过程中，才能真

正认识外界客观的事物”（第80页，重点是引者加的）。这就是说，只有在“趋利避害”的“行动”中，才能获得真理。尽管馮定同志在这段话里使用了像“改造世界”、“认识外界客观的事物”之类的马列主义哲学的术语，但只要稍稍联系一下他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所贯穿的整个观点，我们就可以认识到，这段话正是实用主义所谓“有用就是真理”的主观唯心主义真理观的翻版。馮定的观点同实用主义所谓“有用就是真理”，“真理不过是人应付环境的工具”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馮定同志所说的“行动”，根本不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讲的实践。他从人只是高等动物的基本思想出发，认为人的行动只是和其他生物所共有的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活动，其基础只是兴奋和抑制的生理过程（第68页）。馮定同志说：人和其他高等动物一样，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这种特性，表现在动物身上，就“成为行动”（第55页，重点是引者加的）。而人的行动也是这样（同上）。馮定同志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要把人的行动和动物的行动混为一谈，抹杀人类社会实践的特殊性。

诚然，馮定同志也曾说过实践不同于行动之类的言辞。他说：“违反最大多数人利益的行动决非实践”（第312页），“我是将实践这个词儿专门当做改造世界的行动如像生产、科学实验、革命行动等来用的”（第



10頁)。但是，馮定同志这些声明和申辯，从《平凡的真理》一书的基本观点来看，不过是些掩飾之詞。因为这里的关键問題，在于馮定同志以什么东西作为認識的来源：是以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項实践为認識的唯一来源呢？还是以人和动物所共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活动为認識的来源？在上引那段話中，馮定同志既已明白主张“只有在行动中”，在“争取对己有利而避免对己不利的过程中”“才能真正認識外界客观的事物”，这就清楚地表明：在馮定同志看来，認識不是来源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項实践，而是来源于和一切动物同样具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活动。

从馮定同志的这种錯誤观点出发，必然否定反动統治阶级和一切剝削阶级在認識真理方面的阶级局限性。这可以从他关于反动統治阶级也有唯物观点和辯证思想的謬論中得到印证。馮定同志說：“人如果不是有意塞耳閉目，光是实行内观或者空想，那么因为生活在平凡的事物中，唯物观点总是或多或少不能不有的”(第186頁)。“我們人在生活中，是随时随地都不能脱离客观实际的，因而唯物的观点本来是自然而然会在我們的脑幕上出現的；这对无产阶级来說是这样，对资产阶级来說也是这样；……甚至辯证观点也是这样；因为这也是在客观实际中存在的，……”(同上)。从这些話可以看到，在

馮定同志的心目中，任何阶级（不論他是被剝削阶级或剝削阶级）、任何人的平凡生活或本能活动，都可以提供真理性的認識，甚至可以提供本质上是批判的、革命的辯证法的認識，都可以是辯证唯物主义者。

馮定同志既然已經走上了实用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軌道，那就不能不順着軌道滑下去。果然馮定同志更进一步否定了規律的客观性。他写道：“規律也好，原則原理也好，概念也好，其实都是对具体事物認識的結果”(第214頁)；“規律，只有在人类的实践参加进去的过程中才是有意义的”(第318頁)；火的規律，水的規律，电和原子的規律，都只有人的实践参加进去，才有意义，“否則这些規律仍不免是空洞虛幻而沒有意义的东西”(同上)。这就是說，沒有人的認識和实践，客观規律也就是“空洞虛幻”的，簡言之，沒有人，就沒有規律。馮定同志已經完全陷入主观唯心主义了。

三

馮定同志把人还原为具有共同本性的抽象的、一般的人，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阶级关系，这种观点必然导致否认阶级矛盾、取消阶级斗争的結論，在哲学上，則必然以矛盾調和論代替革命辯证法。

《平凡的真理》中有这样一段話：

“整个的全面的物质世界是在运动的物



质或者物质的运动中统一起来的；永远表现为矛盾的諧和”（第324頁，重点是引者加的）。

所謂“矛盾的諧和”，就是說，一切对立的事物都处于和諧的、協調的，平衡的状态中，簡言之，就是矛盾的調和。現代修正主义者正在大肆宣揚“融和”矛盾、調和矛盾的反动謬論，馮定同志在这里唱的也是同一个調子。

馮定同志說，整个世界是在运动的物质或物质的运动中统一起来的，这句话并不錯。但是馮定同志却由此断定說世界永远是“矛盾的諧和”，这就大錯而特錯了。这二者之間并没有任何邏輯的联系。馬克思主义告訴我們，世界统一于永恒运动着的物质。这里所說的“統一”根本不是什么“諧和”，其基本含意是說，世界上除了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之外，沒有其他任何非物质性的东西。因此，这一馬克思主义的命題不但不意味着世界永远是“諧和的”，而且与此相反，正是表明世界永远是处于矛盾之中的，因为运动就是矛盾，“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①。自然、社会和人的思維，到处都充滿了矛盾。矛盾的規律，即对立統一規律，是宇宙的根本規律。一切矛盾着的对立面，都是又統一，又斗爭，对立面的統一都是有条件的、暫时的，而对立面的斗爭則是絕對的、无条件的，因此，任何矛盾都是不

可調和的，任何矛盾都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斗爭向自己的反面轉化，而不可能出现什么永恒和諧的状态。

主张所謂矛盾的諧和，就必然要否认对立面的斗爭是絕對的，否认对立面通过斗爭而轉化，一句話，必然要把对立面的統一或同一看成絕對的。馮定同志正是这样把对立統一歪曲为对立面的絕對同一，从而販賣他的矛盾諧和論或矛盾調和論的。

表面上，馮定同志也說同一中包含差別或对立，沒有“絕對同一”。但是，他在具体說明矛盾規律时，却把对立的統一，偷換成从矛盾双方中找出来的某种共同性；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抹杀了差別、排除了对立的絕對同一。例如，他在談到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的对立統一時，虽然也說这种統一性表現在剝削和被剝削的关系上的相互依存（即沒有資產階級的剝削就沒有无產階級，而沒有无產階級的被剝削也沒有資產階級），但是接着又說資產階級和无產階級这一組矛盾的双方的統一性还表現在“当資產階級还在进步的时候（按：指反封建时期——引者）并非完全沒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思想的”（第274頁，重点是引者加的）。这样，馮定同志就在大談对立統一的幌子下偷偷地塞进了他的私貨：把同一性变成了矛盾双方的某种共同性（共同利益、共同思想，等等）。

^① 《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93頁。



这种观点是对矛盾同一性的根本歪曲。矛盾之所以为矛盾，就是因为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而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二者之所以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同一性，也正因为它们根本对立、截然相反。用我们的一句俗话来说，这就叫做“相反相成”。例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有同一性，只是因为是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一个剥削，一个被剥削，在利益上根本对立，而决不是由于两者有什么“共同利益”、“共同思想”。资产阶级在其进步时期，在反封建上固然与无产阶级有类似的要求，可以组成联合战线，但是，这是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作为一方而同作为另一方的封建势力相对立而言的，即是就另一组矛盾的关系而言的，至于就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组矛盾来说，二者之间则没有任何共同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组矛盾之具有同一性，决不是由于这种反封建的共同性。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同一性说成是什么“共同利益”，更是完全错误的。馮定同志在上面就是玩弄了这样一个诡辩手法，即抛开矛盾双方的特定的对立关系，而从矛盾双方同其他事物的关系中寻找二者的“共同性”，并且用这种“共同性”顶替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从而抹杀二者的差别和对立。这种所谓同一性，不是绝对同一，又是什么呢？

馮定同志说：“……斗争，实际上就是既有差别，就不能不相互较量而求得一致的意

思”（第 291 页，重点是引者加的）。这就是说，对立面的斗争不是一方克服一方，最后解决矛盾，而是寻找“一致”或共同的东西，以便把对立面联系起来，使之“合二而一”。例如，人们之间因意见不同而发生争论，在馮定同志看来，结果不是正确的意见在斗争中最后克服错误的意见，解决意见分歧，而是双方的意见互相“影响”，互相“渗透”，即在折衷与调和中达到所谓“一致”。阶级斗争也是如此，也是要找出一致的东西，求得团结，和平共处。用馮定同志自己的话说，就是：“只有正视人和人之间，集团和集团之间，民族和民族之间，总是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因而各将各的意见提供出来，经过交换，经过磋商，这才能够达到团结”（第 305 页）。在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也应该“总是竭力主张通过彼此的协商和大国一致的方式来实现和平共处”（第 364 页）。

馮定同志把矛盾斗争归结为“求得一致”，实即使斗争消泯在这种“一致”或绝对同一之中而永远不要突破旧的统一体，这就是公开否认了转化，也就是否认了质变。在他看来，事物的发展、新旧事物的更替，不是由于内在矛盾的推动，不是通过革命性的质的飞跃，而是在保持事物的稳定性的过程中自然地平滑地到来的。他说：“事物在发展中首先倚靠内在的力量，这种力量的表现粗浅说来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其稳定性”。（第 261 页）所谓发展，就是稳定性的“继续”，就是



事物在同周围环境的联系中其稳定性不断“破坏”而又愈趋“完善化”的过程（第247—248页）。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点滴进化的过程。这是一种庸俗进化论的观点。过去和现在的修正主义者都利用庸俗进化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宣扬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等等。馮定同志的这种观点同样也是为他的反对暴力革命、鼓吹“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效劳的。他在《平凡的真理》中说：“今天……对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来说，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是越来越可能了”（第369页）。

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革命的、批判的武器，谁害怕革命、反对革命，谁就不能不害怕辩证法，反对辩证法，歪曲辩证法。馮定同志为了兜售“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全民国家”等一系列的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就在《平凡的真理》中用矛盾调和论或矛盾调和论篡改辩证法。

四

馮定同志从抽象的人出发，在论述社会历史问题时，就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对历史的总的看法是什么？怎样说明历史发展的动力？什么是历史发展的前途？《平凡的真理》在论述这些问题时，表达了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观点。这是同历史唯物主

义相对立的历史唯心主义。

馮定同志认为社会历史是一切人追求幸福的历史，社会发展规律的表现就是：“人类正是从苦难而向幸福在行进”。“而进行的迟速又和人的觉悟及其怎样在有意識的行动有关”（第209页）。这就是馮定同志对历史总的看法。

人道主义对社会历史的解释是以抽象的人性作为推论的起点的。如前所述，馮定同志把求生存、要活命、趋利避害、得乐免苦说成一切人共有的本性。据他看来，从这一点出发，人与人就结成社会，进行历史活动。

人性论总是首先把现实的人变成抽象的人，又把人的本质归结为某种想法和欲念。馮定同志的所谓“人类正是从苦难而向幸福在行进”，实际上完全抹杀了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过程，这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阶级社会里，要求生存的愿望，追求幸福的意向，都是不同阶级的阶级意识，都是由一定阶级的社会地位决定的。奴隶主的求生愿望是骑在奴隶的背脊上作威作福，奴隶的求生愿望就是反抗奴隶主的皮鞭。资本家追求幸福的时候给无产者带来了痛苦，“被压迫阶级的追求幸福的意向岂不是冷酷无情地并且‘根据正当理由’为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意向而作了牺牲品吗？”^①

^①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版，第29页。



不同阶级的人，要求生存、追求幸福是互相冲突的。在阶级社会里，人性就是阶级性，根本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根据抽象的人性，向一切人推荐“活命哲学”，只能是掩饰压迫者的特权和劝导被压迫者安于现状。

人性论又总是把社会的人当成孤立的个人，然后以个人为中心来说明社会。有的读者批评馮定所谓“人为了生活，争取对己有利而避免对己不利”的这种说法是利己主义的，馮定同志在《重印附言》中答辩说：这是“很大的误会”，因为“有利不利，不仅是对个体而说的，而也是对族类而说的。”（第11页）这非但没有消除“误会”，反而更证明读者的意见正确。把人类社会仅仅看成是由“个体”组成的“族类”，这就是抽去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把人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变成了好像羊和羊群的关系。所谓“族类”、“整个社会”，依然不过是许许多多“争取对己有利”的个人的聚集而已。

《平凡的真理》把历史归结为个人的活动，因此就看不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活动，同时也就看不到代表群众的领袖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馮定同志说社会越古，领袖的作用越大；到了共产主义时代，“领袖的观念也将无形消失了”（第390页）。从这种错误观点出发，他又进一步附和了现代修正主义“反对个人崇拜”的谬论。从前的历史唯心主义，把历史归结为几个“大人物”的作用。馮定同志同样也是以个人的活动来解释

历史，但他把历史归结为“小人物”的作用。作为“平凡的人物”的个人，趋利避害的活动就是历史。所以他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说：“生活就是历史”。

总之，“人类正是从苦难而向幸福在行进”，这种对历史的总的看法，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历史，用个人追求功利的活动来解释历史，因而是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观。

《平凡的真理》对于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论述也是错误的。书中虽然也有关于阶级斗争的词句，但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人类的劳动和精神……浪费在人和人的斗争或者战争中”（第129页）。竟至于向“有理性的人”发出一个仁慈的号召：“动植物一般也不是同种相残的；……那么有理性的人，当生产力已是这样发达的时候，为什么还要提倡同种相残呢！”（第267页）

馮定同志到底怎样看待阶级斗争呢？他把阶级斗争说成是“人为的大灾害”，总是用消极的、伤感的眼光来描绘它的“激烈和残酷”，从来不提革命的阶级斗争对于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积极作用。在馮定同志所提供的社会发展史的图景中，是看不到阶级斗争这一基本线索的。他只是说：“奴隶对生产日益不感兴趣，……于是奴隶制社会就非由兴旺到衰落不可了。”“农奴或者农民对生产日益不感兴趣，于是封建制社会就非由兴旺到衰落不可了”（第115页）。历史上轰



轰轰烈烈的奴隶起义、农民战争，在馮定同志的笔下都被勾销了。既然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那么又是什么呢？馮定同志给历史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最后发条”，叫做“劳动生产”（第106页），而又把“劳动生产”归结为“人的本能”。

当然，马克思主义也把历史看作是生产的发展史。但问题在于馮定同志对生产的理解是和马克思主义根本不同的。馮定同志从人类劳动生产中抽去了社会的本质，就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歪曲为生产力论，认为社会的发展就是决定于生产力的自行发展。

馮定同志的生产力论，是从人性、从人要求生存的愿望直接导引出来的。他写道：“正是因为人要求生存就不得不有不断生产的行动，而在不断的生产中生产工具就必然不断改进，生产技术就必然不断提高，于是也就出现了生产力不断向上的规律，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等等的规律”（第215—216页）。从“人要求生存”引出了“生产力不断向上的规律”，那么，只要人并不放弃“要求生存”，生产力就一定能合乎“不断向上的规律”自行发展了。这就是说，生产力不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得到发展；不改变生产关系，生产力按自身的规律就能“不断向上”、“直线向上”，或者说，生产力合乎“不断向上的规律”发展了，生产关系也就自然而然地改变了。而社会发展阶段的高

低，也仅仅是由生产力的高低来决定的：“任何生产力较高因而也就发展较高的社会，都是经过发展较低的社会而来的。”（第125页）生产力的水平成了衡量社会发展程度的唯一标志。这原来是第二国际人物和布哈林的陈腐不堪的调子。

毛泽东同志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①《平凡的真理》所表达的人性论的历史观，正是站到了阶级斗争观点的反面，在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宣扬生产力论，因而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毛泽东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必然引导到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前途。馮定同志离开了阶级斗争这一历史的基本线索，因而不可能正确认识历史发展的前途问题。馮定同志不说共产主义是只有无产阶级才真正愿为其实现而奋斗的伟大理想，而是一心要把它说成一切人的“乐园”，不论谁，只要“不自觉的或者自觉的认识了”他所发现的那些历史规律，就会“觉得社会主义是合乎理性、正义和普遍道德的好东西了”（第225页）。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91页。



爭。但《平凡的真理》的作者用十分明确的語言否認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階級。无产階級專政的国家在对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的同时，必須对剝削階級实行專政，而馮定同志却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真正全民的民主”。否認階級斗争和无产階級專政，这在理論上是荒謬的，而在政治上，則是站在資产階級方面向无产階級进行階級斗争，助长資本主义复辟的活动。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平凡的真理》中沒有說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間是否还有矛盾，但肯定地說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間已經沒有矛盾了：“誰都知道生产力的繼續提高，也就是人类幸福的繼續提高，所以誰也不会对生产力有意加以阻撓的。”（第373頁）《平凡的真理》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看作人类历史从苦难到幸福的完成，一切社会矛盾当然也就都消失了。

总括以上所說，《平凡的真理》的作者是用人性論来解释历史，抹杀階級斗争、宣揚生产力論，用福利国家来代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这种历史观是反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不断革命、反对无产階級的世界革命的。

* * *

由此可見：

一、《平凡的真理》是一本庸人哲学，也就是資产階級哲学，是与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針鋒相对的。它只讲个人“趋利避害”，不讲階級斗争和革命，它要人們放弃一切崇高的理想，只在个人生活上寻求滿足。这本书是帮助資产階級毒害青年的一本坏书。

二、这本书是由各种資产階級腐朽思想拼凑而成的，折衷主义色彩十分濃厚，而主要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燴。它在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外衣下，利用各种資产階級哲学，系統地歪曲了辯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揭露和批判这本书的資产階級思想实质，是无产階級与資产階級在意識形态領域的階級斗争的一部分，必須大力进行。

三、这本书也是現代修正主义的哲学。現代修正主义者宣传耍脑袋不要革命，而馮定的这本书也就是为現代修正主义这种活命哲学作宣传的。

四、这本书再次告訴我們一个真理：在今天如果有誰否認階級和階級斗争，不管他为自己說了多少好話，他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者和馬克思主义者。我們必須用这个标准去鉴别一切思想和言論。





編者按：本刊发表张启勳同志的《評馮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来信以后，陸續收到許多讀者來稿來信，參加討論。現將一部分來稿來信摘要发表如下。



过渡时期沒有階級斗争嗎？

关于我国过渡时期的階級和階級斗争問題，馮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中写道：“中国資本主义工商业自从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和定股定息以后，已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資產階級和无产階級的矛盾也已經基本上解决了”。“从国际來說，因为帝国主义繼續存在，所以階級斗争还是尖銳和劇烈的；但是从国内來說，除了和帝国主义呼应的潜伏破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仍須清除外，階級斗争一般說來是已成了残余了”。馮定同志还嫌这种說法不够明确，在一九五七年初写的《重印附言》的結尾，干脆說得更明确一点：“今天，……至于国内，除了仍須警惕从帝国主义方面而来和潜伏的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

活动以外，当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的矛盾已經基本上解决了的时候，自不能再強調階級斗争的紧张的。”

首先，我认为馮定同志所說的两个階級的矛盾已基本解决的提法，是錯誤的。毛泽东同志早在全国解放前夕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說过：“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問題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①一九五七年，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屆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會議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434頁。



他又指出：“在我国，……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①一九五八年五月举行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同志在他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②由此可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国并没有解决。这里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像这样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这些讲话发表以后，冯定同志仍然在该书的一九五九年第二版和一九六〇年的第十次印刷本中，保留着同中央背道而驰的提法，这不能说是疏忽的缘故，而是显然有意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

冯定同志这个论点也完全违背客观事实。就在冯定同志写《重印附言》的一九五七年，我国资产阶级右派曾经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了猖狂的进攻。他们叫嚣要和党“轮流执政”，甚至于要共产党下台，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民主”、“自由”，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妄图把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烧掉。这一

年，应该以阶级斗争是非常激烈的一年而载入我国史册。是否只有一九五七年阶级斗争才是激烈的呢？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十五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论断。

我们还看到，冯定同志的这种提法，在一九五七年以前的版本中还没见过，却单独出现在一九五七年的《重印附言》和一九五九年的第二版中。不能不指出，冯定同志恰恰在一九五七年提出这种观点，在客观上起了一种极坏的作用。

从上述错误观点出发，冯定同志在《平凡的真理》一书中还发表了許多抹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错误观点。

（一）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能否在过渡时期中一劳永逸地建立问题。

冯定同志在论述生产关系问题时写道：“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虽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孕育和成熟，但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只要经过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期，那么也就能一面建设一面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

①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6—27页。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



产关系来了；这样也就‘一劳永逸’地消灭了对生产资料私有财产制度，因而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并使科学和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永远迅速向上；从此，新的生产关系的适合新的生产力，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反动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来阻挠和抗拒了，而可以通过人们有意识的有计划的行动来进行了。”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有联系而又有差别的，这点谁都知道。如果说全世界都实现了共产主义，那么作者所说的一劳永逸地消灭对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消灭阶级，那是真的。但是，作者在这里明白写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问题。试问：“在一面建设一面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过渡时期中，而这个过渡时期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怎么能够“一劳永逸”地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呢？怎么能够“再也不会会有什么反动的剥削阶级和统治阶级来阻挠和抗拒了”呢？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列宁早就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被推翻的剥削者必然存在复辟的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也不是再也没有统治阶级的抗拒了，列宁说：“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已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拚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①。历史告诉我

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终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但是，这个实现的过程，是一个充满你死我活斗争的过程，是存在着资产阶级复辟的可能性，会遭到被推翻的剥削者和统治者疯狂抗拒的过程，企图“一劳永逸”地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那只不过是骗人的空话而已。

(二) 关于人类的完全平等、全民的民主问题。

在叙述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时，馮定同志写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首先认为人类是完全平等的”。“比如民主这样的概念，从资产阶级当做反封建专制的口号开始，经过资产阶级所实行的虚伪的民主，再经过无产阶级革命给予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真正的民主，直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的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下的真正全民的民主”。

平等、民主，在阶级社会里，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那是有阶级性的，然而馮定同志在这里硬说，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们认为，而且还是首先认为，人类是完全平等的，社会主义实行的是什么全民的民主。不可否认，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人民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人民享受的民主，的确也正是在集中指导下的真正的民主。但是，能不

^①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35—236页。



能因此认为在今天的阶级社会里，人类是完全平等的，可以实行全民的民主呢？当然是不可能的。在今天，当国际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在国内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时候，如果提倡什么“全民民主”和“人类的完全平等”，那就意味着叫已经获得解放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被推翻了的国内反动统治阶级一起享受民主，意味着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和骑在他们头上的统治阶级讲阶级合作。试问：这种超阶级的“全民民主”和“人类的完全平等”与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所吹嘘的“全民民主”、“全民国家”、“人类平等”又有什么区别呢？

（三）关于建设时期的工作问题。

作者写道：“然而在建设时期，就没有武装斗争时期那样轰轰烈烈的东西了，而主要的是按部就班和细琐繁杂的工作了。”我不知作者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来，我也不明白作者所指的轰轰烈烈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我国人民干的都是前人没有干过的伟大事业，在这样伟大的、崭新的、艰巨的事业中，能够说就没有轰轰烈烈的工作和斗争，而只有按部就班和细琐繁杂的工作吗？目前，全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正在积极投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

命运动中，正在广大的城乡如火如荼地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难道不是轰轰烈烈的事业？只有不看现实，闭门造车，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毫无热情的人，才会得出馮定同志这种结论：

（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

人类历史要前进，社会主义社会要前进，那么是什么力量促使社会主义社会前进呢？作者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新社会发展的动力”一节中说：“在旧的有阶级的社会里，社会的矛盾表现为阶级斗争，所以阶级斗争就成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在新的无阶级的社会里，社会发展的动力就不再是阶级斗争了。”又说：“批评和自我批评不仅是进行残余的阶级斗争的武器，而且永远也将是社会主义以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馮定同志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了。他甚至把“批评”神化起来，说它还可以去“批评”反动的敌对阶级分子，可以是进行“残余的阶级斗争”的武器，可以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唯一无二的动力。在这里，馮定同志不知道把阶级斗争放在哪里去了？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了吗？试问：在阶级和阶级



斗争依然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不用阶级斗争去打退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你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击退他们吗？反革命分子在匈牙利叛乱，西藏地方的上层反动集团和外国反动派勾结发动武装叛乱，不是用阶级斗争，不是用枪杆子镇压叛乱分子，你能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批评倒他们吗？不能，一万个不能。

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今天仍然是生活在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我们没有也不

可能有其他的出路，而只有一条路，这就是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说的：“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过去，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在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①

（共青团广西僮族自治区

柳州市委员会 冼光位）

敌我矛盾不容调和

馮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第九节《成事在人》中有这样一段话：“试拿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来说，因为反革命分子走的是死路和绝路，因为有不少人被政府的宽大政策所感动，向政府认过悔罪，以至立功赎罪，使潜伏暗藏的反革命组织粉碎瓦解，所以这种矛盾的范围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国解放以来不少反革命组织的“瓦解”，不少反革命分子的认罪悔过，敌我矛盾的“缩小”，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反

革命分子认识到自己所“走的是死路和绝路”，因此回心转意，洗手不干了。二是“政府的宽大政策”使反革命分子深受“感动”，于是“认过悔罪，以至立功赎罪”。在这里，阶级和阶级斗争不见了，无产阶级专政不见了，我们只看见人性理智在发挥作用，我们只看见一幅阶级调和的图画。

馮定同志的这种说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篡改，是对我国人民民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致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通告信”）》。《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2页。



主专政的歪曲。

馬克思列宁主义一再告訴我們：无产階級取得政权，并不是階級斗争的結束，而是階級斗争在新条件下的繼續。革命同反革命的斗争，是社会主义社会中階級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它将存在于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无产階級为了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为了保证建成社会主义并过渡到共产主义，就必须建立、巩固并加强自己的革命专政，严酷无情地镇压階級敌人的各种破坏和顛覆活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无产階級要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階級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①“誰不了解这一点，誰就不是革命者，誰就沒有資格当无产階級的領袖或顧問。”^②

十五年来，我国已經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各种反革命集团和反革命分子。“就全国來說，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③这是勿容怀疑的。但是，这些成就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不是如馮定同志所說是“因为反革命分子走的是死路和絕路，因为有不少人被政府的寬大政策所感动”呢？不！絕不是！众所周知，解放以来，我国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之所以获得重大胜利，主要的和基本的原因是

由于我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掌握和发挥了强大的无产階級专政的国家机器的作用。我国的武装力量——人民解放軍和广大民兵，警惕地監視着敌人的动向，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了美蔣反动派的侵犯和窜扰，保卫了祖国的安宁；我国的司法、检察和公安机关，分工負責，統一对敌，只許敌人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乱說乱动，如果乱說乱动，立即予以取締，从而又稳又准又狠地打击了公开的和隱蔽的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维护了社会秩序，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我国的亿万人民群众，密切配合政法机关的对敌斗争，造成了陷反革命分子于灭頂之灾的汪洋大海。正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正是由于无产階級专政的强大威力，正是由于革命的群众运动，才使我們相当彻底地肃清了反革命分子，才“使潜伏暗藏的反革命組織粉碎瓦解”，这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嗎？

固然，“反革命分子走的是死路和絕路”，但是，这怎么可能“縮小”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呢？灰尘尽管骯髒，可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一切反动階級必然要

① 《国家与革命》。《列宁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版，第448頁。

② 《向匈牙利工人致敬》。《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版，第351頁。

③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第16頁。



违背社会的进程，抗拒历史的潮流；即便在他們被推翻以后，也总是过高地估計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計人民的力量，总是企图“螳臂擋車”，“蚍蜉撼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搗乱，失敗，再搗乱，再失敗，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邏輯，他們决不会违背这个邏輯的。这是一条馬克思主义的定律。”^①

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国民党反动派統治中国的时期，豢养了大批的爪牙——土匪特务、伪軍警宪、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他們对于自己在中国国土上的失敗，当然是决不甘心的。新中国成立十五年来，美蔣匪帮和一切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反革命分子，一刻也沒有停止过他們的反革命和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处心积虑地妄想顛覆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重新騎到人民头上来作威作福。因此，他們和革命人民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对抗性的矛盾，要他們不反对人民，不反对革命，无异与虎謀皮。

誠然，有不少反革命分子是向政府投案自首的。但是，一方面，投案自首的反革命分子毕竟是一部分，怎么能“以偏概全”呢？另一方面，更主要的，这些反革命分子只是懼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威力，处于人民群众的“四面楚歌”之中，同时由于党实行“首

恶必办，胁从不問，坦白从寬，抗拒从严，立功折罪，立大功受奖”的肃反政策，有力地打击和分化了反革命势力，这才使他們投案自首的。沒有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的手腕，“不經過持久的、頑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經過坚持不懈、紀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統一的战斗”^②，这些在旧軌道上生活慣了的反革命分子，怎么可能老老实实地向人民认罪呢？馮定同志絕口不提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不提无产阶级专政，而侈談革命同反革命的矛盾的“縮小”，这决不是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态度。

当然，我們所說的肃清反革命，并不是把一切反革命分子都从肉体上加以消灭。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們，在他們的政权被推翻以后，只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坏，不搗乱，也給土地，給工作，让他們活下去，让他們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們如果不願意劳动，人民的国家就要强迫他們劳动。也对他們做宣传教育工作，并且做得很用心，很充分，像我們对俘虏軍官們已經做过的那样。这也可以說是‘施仁政’吧，但

① 《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0頁。

②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版，第6頁。



这是我們对于原来是敌对阶级的人們所强迫地施行的，和我們对于革命人民内部的自我教育工作，不能相提并論。”^① 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我們党制定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劳动改造与思想教育相结合的政策。事实证明，党的这一政策是英明正确的，也是卓有成效的。許多反革命分子通过劳动改造和教育启发，逐步地改变了原来的反动思想和反动立場，开始认罪伏法，痛改前非，并且学会了一定的生产技能，从四肢不勤的寄生虫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样，我們就把消极因素化为积极因素了。

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訴我們：对于反革命分子，首先是镇压，只有镇压才能使他們服罪（不是全部服罪，必然有些执迷不悟的反革命分子会頑抗到底），否則，宽大脱离了镇压，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

我們知道，大部分反革命分子在解放前是欺压人民、好逸恶劳的，长期的反动統治，使得他們的头脑中不但充滿根深蒂固的反动观点，而且浸透了剝削寄生的生活恶习，要彻底改变他們的反革命反人民的立場，要彻底改造他們的剝削阶级思想，不经过长期的严重的政治和思想斗争，是决不可能的。因此，“他們的被改造，須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

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②。在这个过程中，必然有一些頑固分子会抗拒改造，这就需要专政机器去强迫他們劳动，强迫他們改造；而且在刑滿释放以后，在一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或者遇到风吹草动，有些反革命分子还可能旧病复发，重新进行反革命活动，这样，人民的政权就还要對他們实行专政。很难設想，不依靠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不经过长期艰巨反复的斗争，这些反革命分子会自动地改邪归正，“认过悔罪，以至立功贖罪”。

总而言之，我国十五年来肃反斗争的伟大胜利，离不开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离不开无产阶级专政，离不开革命的群众运动。馮定同志对这些視而不見，对解放以后我国人民同反革命进行尖锐斗争的事实置若罔聞，而空談什么矛盾的“縮小”，这在理論上是錯誤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我們决不能同意馮定同志的这种說法。

（北京大学学生 俞建平）

^① 《論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1頁。

^② 《实践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第2版，第285頁。



英雄事迹从哪里来？

馮定同志說：“董存瑞和黃繼光，在一瞬間是不可能將一己的利益和大眾的利益進行詳細的比較、考慮和選擇的，而可能只是一種正義的衝動”。

馮定同志對英雄人物的這種估價，我們決不能同意。

我們偉大的人民英雄董存瑞、黃繼光等同志，眼觀全球，胸懷世界，有着為祖國、為黨、為人民奮鬥終生的偉大理想，有着為世界人民的解放而奮鬥的偉大理想。因此，在無論什麼場合，無論什麼時間，他們總是把集體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一旦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發生矛盾，他們毫不猶豫地使個人利益服從於集體利益，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這種思想修養，是在日常鬥爭中鍛煉造就出來的。英雄們清清楚楚地知道：在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不能兼顧的時候，能否堅決棄去個人利益，維護集體利益，是考驗自己是不是一個真正的革命戰士的關鍵時刻。他們無論在平時或者在危急的關頭，都會將一己的利益和大眾的利益進行比較的，而他們

在危急的關頭能夠做出正確的選擇，正因為他們在平時做過比較，有了正確的認識，決不是像馮定同志所說的那樣：“在一瞬間是不可能將一己的利益和大眾的利益進行詳細的比較、考慮和選擇的，而可能只是一種正義的衝動”。

事實不正是這樣嗎？如果說，董存瑞、黃繼光在臨犧牲時沒有人在場，沒有人聽到他們說些什麼（然而，從他們的出身、經歷、日常的所思所想，所作所為，我們是完全可以知道他們為什麼會有那些英雄表現的），那麼請來看看向秀麗、劉文學吧！當烈火衝向向秀麗的時候，她在這一瞬間是不可能將一己的利益和大眾的利益進行詳細的比較、考慮和選擇的嗎？不是的。她完全考慮到，如果烈火引起金屬鈉的爆炸，工廠的財產、同志們的生命，都會遭到嚴重地損失。這時，擺在她面前有兩條道路：一是逃跑；一是勇敢救火，舍身為公。向秀麗果斷地選擇了後者，而棄去了前者。當同志們看到向秀麗的鞋、褲都着了火，便撲過去為她滅火，可是向秀麗同志卻大聲喊道：“別管我，快去搶救



金属钠!”向秀丽是这样，刘文学也是这样。刘文学捉住坏蛋王荣学不放，王荣学就利诱我们的小英雄，从腰里掏出一元钱来收买刘文学，可是，刘文学断然将那元钱摔在地上，并厉声说：“谁要你的臭钱，我要保卫公社的利益!”他抓住王荣学的衣服，要拖他到公社治安委员那儿去。坏蛋王荣学看到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一把捏住刘文学的手，威胁着说：“你敢拖，我捏死你!”事情不又是很明显吗?摆在刘文学的面前同样有两条道路：一是对坏人的破坏活动不管，放掉坏人，保住自己一条生命；一是和敌人斗争到底，誓死不屈。我们的小英雄怎样呢?他同样是选择了后者而弃去了前者。他听到王荣学要下毒手，便大声喝道：“你捏死我，我也不放走你这个坏蛋。”这声音撕碎了当时的夜幕，使得敌人胆战心惊。这怎能说是“在一瞬间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的比较、考虑和选择的”呢?既然有比较，就是一种受到理智支配的行动，而决不是什么“正义的冲动”。

再说，馮定同志所说的“正义的冲动”的来源，也是十分令人费解的。馮定同志说：“然而这种冲动，对先代的义士们、烈士们来说，正是平时深明大义或者说是认识国家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才能有的，对现代的我们来说，正是平时深明革命的意义和

不断接受共产主义教育的人才能有的。”既然烈士们平时深明大义，深明革命意义，他们的行为就是受到理智支配的，怎么会是一种“冲动”呢?馮定同志说，英雄行为“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那么，“平时深明革命意义”，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呢?显然，馮定同志论述问题的逻辑，是十分混乱的。

由此可见，馮定同志在发挥了他的“正义的冲动”的观点以后，虽然加上了一个他们“平时深明大义”的尾巴，但是，这个尾巴既然同“正义的冲动”的观点相矛盾，自然也就不能补救这个观点的错误。

还应当指出，馮定同志的这种说法，是有意或无意地在否定英雄人物的阶级立场。

人们的言语行动，都是受一定的阶级意识所支配的，为自己的阶级利益服务的。英雄人物，则更是本阶级利益的最忠实的保护者。黄继光、董存瑞、向秀丽、刘文学、雷锋等同志，被我们歌颂为英雄，是因为他们最大限度地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但是，馮定同志所宣传的观点，恰恰是否认了这一点。因为，既然馮定同志断定董存瑞和黄继光，在一瞬间是不可能将一己的利益和大众的利益进行详细比较、考虑和选择的，那么，黄继光究竟是为了那个阶级干出可歌可泣的业绩，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了，因为反正只是一种正义的冲动罢了。这等于是说，像



黃繼光那樣的英雄，已經完全失去了他們原有的階級立場，而變成超階級的人了。這種說法，對英雄人物當然是一種誣蔑。

事情既然是如此明白，馮定同志為什麼要宣傳他那種錯誤的論點呢？我認為，問題的實質在於，馮定同志有意或無意地在否定英雄事件能夠誕生的先進的思想基礎，有意或無意地在否認人們的思想革命。

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導下，我國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正在加強政治理論學習，不斷改造自己的思想，不斷提高認識水平，不斷向無產階級革命化的道路邁進，堅定地樹立起為人民、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革命人生觀。黃繼光、向秀麗等同志之所以成為英雄人物，就是因為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重視改造思想，不斷提高自己的認識，不斷走革命化道

路的結果。平凡而偉大的戰士雷鋒的共產主義世界觀的形成，更是一個光輝的典範。雷鋒非常注意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言語行動。他的生活歷史向我們表明：只有在實際工作中注意鍛煉自己，才能够把自己改造成為一個真正的共產主義戰士。我們应当向雷鋒、向一切英雄人物學習，在日常生活中嚴格要求自己。

如果英雄事件的誕生不是這樣，而是像馮定同志所宣傳的那樣，只是一種“正義的衝動”，那麼，我們黨所提出的不斷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不斷進行自我教育，不斷改造思想，走革命化的道路等等號召，都是沒必要的了。

（陝西省華縣赤水公社

青年農民 李小林）

駁“和平轉變”論

張啟勛同志批判了馮定同志在《共產主義人生觀》一書中所提出的中國革命的勝利就可以向社會主義的社會和平發展的錯誤觀點，是十分正確的。我發現，馮定同志在他所寫的另一篇文章《關於不斷革命論和革命發展階段論》（見“青年共產主義者叢刊”第

十三集：《學習毛澤東著作的體會》，中國青年出版社一九五九年四月出版）中，這個錯誤觀點表達得更加明確，更加露骨。由此可見，馮定同志的這個錯誤觀點不是偶然產生的，不是孤立的，而是一貫這樣認識的。

馮定同志在這篇文章的第三節中說：“中



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相一致的思想，而且实现了和平转变。”又说：“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像党的争取和取得革命领导权，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以至最后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等等，说明社会主义的因素是早已出现了，而且也说明和平转变的条件是在逐渐具备的”。

这就是说，冯定同志不仅认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就可以向社会主义社会和平发展，而且认为，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逐渐具备了“和平转变”的条件。如果说，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其主要错误在于抹杀了我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所存在着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那末，冯定同志在《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一文中的这个观点，就明白地否认了我国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能够通过和平道路消灭剥削制度，是因为我国人民进行了长期的、严酷的革命武装斗争，实现了由工人阶级掌握国家领导权这个极其重要的前提。

为什么我国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能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和平改造的

道路，即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而达到社会主义国有化的目的呢？这是因为我们连续打了二十二年的仗，我们用战争打垮了大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的统治，没收了占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百分之八十的官僚资本，这样才使我们有可能对占百分之二十的民族资本家采取和平的方法来加以改造，这是因为“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① 冯定同志根本不提这个极其重要的前提，而在那里宣传什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已逐步具备了“和平转变”的条件，正如张启勋同志所说：“这是对中国革命历史的歪曲。”

难道说，中国革命，不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推翻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不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民族资产阶级就能够老老实实地接受和平改造？冯定同志始终避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冯定同志说什么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毫无根据的臆断。刘少奇同志指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发展了近代工业，领导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一定

^①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82页。



程度上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具体条件下，采取了接受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态度，接着又逐步地采取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态度。”^①刘少奇同志这个论断，才是科学的、符合历史事实的。

冯定同志不仅用他的“和平转变”论来歪曲中国的革命历史，而且用它来歪曲当前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现实。他在这篇文章的第二节中说：“革命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就不必定要再经过内战，再经过流血的革命，而可上下配合，使政权在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下，一步一步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

当然，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由于我国在革命过程中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一般来说，社会主义革命“就不必定要再经过内战，再经过流血的革命”。但是，“革命的不断发展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完成”，决不是“上下配合”可以实现的。

冯定同志所说的“上下配合”，究竟指的什么内容？是指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级和下级的关系，还是指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级和下级的关系，不是什么“上下配合”的关系，而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如果指的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那末，群众是由各个阶级组成的，社会主义

革命，是不是要取得所有的阶级的“配合”呢？究竟指的什么？我还不十分清楚。但是，我清楚地知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任务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强有力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进行阶级斗争，而决不是冯定同志所说的什么“上下配合”。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内容，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中，如果违反阶级斗争始终继续的客观规律，否认阶级斗争，就根本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发展和完成”，而只能是资本主义复辟。

冯定同志在论述如何“一步一步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时^①候，根本不提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提什么“上下配合”这种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除了把人们引入迷途以外，还能产生什么作用呢？

（中共浙江省诸暨县委员会 陈瑞苗）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4页。



西方基督教神学 是怎样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楊 真

历来一切剥削阶级总是标榜宗教和神学是“超阶级”、“超政治”的绝对真理，用以欺骗人民，麻痹人民，达到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目的。资产阶级神学家为了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搜罗了当代各种各样的反动理论，以那些腐朽反动的思想作为素材，进行加工，使之披上宗教术语的外衣。

这些资产阶级神学家，宣称从“神的启示”出发，从“圣经的永恒真理”出发，把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组成体系的大山，压在反抗资本统治的广大人民头上。尽管他们打着各种各样的牌号，但是，各种派别的说教，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这一点上，并无差异，只是他们贩卖反动思想的重点和玩弄宗教术语的手法有所不同而已。资产阶级哲学家华尔特·考夫曼曾经拆穿这些神学家的西洋镜说：在今日西方教会中，所谓神学研究，不过是一种无聊的拼图游戏。要拼凑出什么图样是早已规定了的，各种圣经经句无非是可供任意剪裁、任意取舍的纸板，神学家们

只是以独断的方式，各玩各的一套把戏。^①

许多西方神学家口口声声说，他们的神学是出发于上帝，归结到上帝。其实，他们自己心里雪亮，他们的神学是出发于政治，又归结到为政治服务的。美国的反动神学家莱因霍·尼勃就曾经宣称：任何抽象的神学命题，总离不开现实的利益^②，“衡量任何思想体系的一个标准必须是政治的智慧”^③。这就是说，他们自己也承认，政治效用是估价神学作用的标准。

在美国，神学更是赤裸裸地被用来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一九六一年三月，美国《报道者》杂志刊载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思想：一种新的

① 《宗教与哲学的批判》，第219页。转引自1962年9月19日《基督教世纪》周刊，第1123页。

② 《人的本性与伦理》第2卷，1943年伦敦版，第236页。

③ 《伯特为什么在匈牙利问题上沉默》。1957年1月23日《基督教世纪》周刊，第108页。



国防工业》。文章报道，美国成立了許多“公司”和“研究所”，它們雇用了各种专家，接受美国政府所給予的任务，从事战略战术、武器、外交政策、裁軍等問題的专题研究，提出各种报告。在这些研究科目中，就包括有神学。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現在美国的神学研究，已和制造枪、炮、导弹一样，被并列为战争“工业”，可以按照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規格”，用“訂貨合同”方式，加工制造出来。

下面就讓我們考察一下，西方基督教神学是怎样为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反人民的全球战略服务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作为世界資本主义总危机的反映，西方神学的主流一直是以瑞士神学家巴特为代表的所謂“危机神学”。这一神学流派宣称，人类絕无希望，唯有等待天地末日来临，人类历史完結，由耶穌基督施行救贖。这个神学潮流受到了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欢迎，风行到五十年代中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国主义企图以新的世界战争威胁来建立它的世界霸权，实現在它統治下的“世界一体化”，把核讹詐作为它的对外政策的基础。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这一政策的需要，西方的一些神学家也把核讹詐政策演化成为基督教的历史观。他

們竭力渲染核战争的恐怖，說什么“在我們的时代中，这个星球和其上一切生物遭到灾难性的毁灭，已經可怖地成为真实”^①。他們宣称：“历史只是一場噩梦”，“基督徒和存在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同样，看不出世界历史有任何意义”，“历史本身也是一部罪的历史”。^②

从这种反动的历史观出发，他們竭力宣揚苦难的人生观，說什么上帝呼召人“自願地担当苦难”。他們不仅鼓吹忍受苦难，而且进一步提倡欣赏苦难和推崇苦难，說什么“上帝正以扩大悲剧的办法，促使人們改变过去的伦理观念”；“在受苦之爱中就与基督一同为王”。^③

这种神学，只能称为核讹詐神学。美帝国主义的核讹詐政策，到了这批神学家手中，已經演化出一整套反动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伦理观。美帝国主义給全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而西方基督教神学却为它加上了一个“圣光环”。

一九六一年，由美帝国主义控制的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在新德里举行大会。当时，美国垄断資本家的喉舌《时代》周刊，特別推

① 見保羅·弗吉斯：《耶穌基督在普世历史一元化时代的終極性》。《普世教会評論》1962年10月号，第22頁。

② 見《世界信义宗》杂志1963年7月号，第264、262、263頁。

③ 保羅·弗吉斯：《耶穌基督在普世历史一元化时代的終極性》。《普世教会評論》1962年10月号，第22、24、25頁。



荐这次大会的美国讲員、芝加哥大学神学院教授約瑟夫·西特勒。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认为，共产主义为人与世界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前景。对比之下，基督教已萎縮成为“我們軟弱中的支持，孤独中的伴侣，神經病患者的安慰和我們国家的在天之佑”。于是，他狂妄宣称：现在需要一个囊括宇宙的基督論，这种基督論要使“灵性的核心光”照到“經濟、政治和人类事务的一切方面”。^① 西特勒这些话，充分透露了美帝国主义要求西方神学家制造一套新的神学体系来适应它的反革命全球战略的意图。为此，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号召全世界教会，在今后几年內，集中研究所謂“在普世历史一元化的时代中，耶穌基督的終极性”^②。

这一套新基督論的基本要点，就是宣传世界主义，为美帝国主义实现“世界一体化”的全球战略服务。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一些反动的西方神学家首先从人性論方面来宣揚资产阶级的极端个人主义。过去，他們为了宣揚世界末日，否定历史，就要大讲人的罪性，強調人的墮落敗坏，无可救药。而現在，他們却把十九世紀资产阶级的神学老調翻了出来，強調人具有上帝的形象，与上帝一样拥有自由意志。

过去，西方资产阶级神学根本不承认有什么基督教社会。当时，流行的讲法是，人們再也不能用违反聖經的幻想来欺騙自己，說可能出現一个合乎基督教理想的世界，世

界的罪恶决不是若干社会改革所能医治的。而現在，他們却大肆标榜资本主义社会，是合乎公义的“基督教社会”。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研究委员会主席、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德学院院长約翰·馬許并且說：“完全可能有一个社会，根据基督教对人生的理解来安排生活，而决不要求其中每一个人都是基督徒。”在这种所謂“基督教社会”里，“十字架就使那本来不可能沟通的人們，……奴隶和自由人，……有文化的人与野蛮人之間，……得以跨越鴻沟，联結起来。”^③

按照他們的說法，“世上一切生物都由創造的主宰把它們納入了一定的軌道，像太阳系中各个星球一样，必須在它自己的軌道上运行，在它的深处則与上帝联結在一起。”^④ 这就是說，帝国主义、剝削阶级按照剝削的軌道永恒运轉，殖民地被剝削的广大人民也必須按照被剝削的軌道永恒运轉，两者联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永恒統治。他們认为，这就是“上帝在十字架上早已預示的，使普世历史与上帝和好”的图样，也就是所謂“在普世历史一元化时代中，耶穌基督的終极性”。^⑤

美帝国主义的全球战略、“世界一体化”就这样經過一些反动神学家的手，貼上了“普

① 轉引自《普世教会評論》1962年7月号，第501頁。

② 世界基督教协进会研究組公报第8卷，第2期。

③④⑤ 《耶穌基督在普世历史一元化时代中的終极性》。《普世教会評論》1962年10月号，第7、9、10、11頁。



世历史观”、“福音里的自由”、“十字架上的和好”、“三位一体上帝的统治”等等基督教标签，推销到各国基督徒中去。

总之，为了密切配合美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全球战略，西方的一些反动神学家拿上帝作招牌，对基督教的教义进行了种种自相矛盾、语无伦次的诡辩。他们一会儿说，上帝与罪恶世界是完全隔绝的，因此，人类的历史毫无意义、毫无希望，要求人们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放弃斗争；一会儿又说，上帝正在人类历史中加紧工作，使世上一切逐渐结为一体。过去，基督论强调所谓“耶稣基督的独特性”、“超越世界”，以此来否定世界；而现在却又强调耶稣基督“降世为人”、“道成肉身”，以致一切人类事务都俨然有耶稣基督插手其中，借此鼓吹基督徒要渗入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从事反动的政治活动。^①在这些帝国主义神学家手中，上帝也好，基督也好，都是这样挥之即去，召之即来的。

二

近年来，一些反动的西方神学家为了适应美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阴谋，一反过去竭力抵制“和平共处”这个字眼的态度，也大肆标榜要从神学上来谈论“和平共处”了。

他们宣称：要把敌人、朋友的观念从人们心目中除去，才能得到“福音里的自由”。

在“福音里的自由”中，人性——无论敌人或朋友——都是一样的。谁要是揭露、指摘敌人，谁就是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这就是说，世界上一切革命的人们都不许揭露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它的罪行。

他们宣称：为了“和平共处”，还要进一步“站到对方的立场上去体会它”，要“学习为对方而活”，要“紧密合作”，反对任何地方的任何战争，如老挝、刚果。很清楚，这是不许被压迫民族起来革帝国主义之命，并且企图要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帝国主义的伙伴，同它们“紧密合作”，一起去镇压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解放运动。^②

人们不难看到：这种神学理论，正是美帝国主义所竭力寻求的压制世界人民革命、颠覆社会主义国家的肮脏武器。长期以来，一些为美帝国主义效劳的西方反动神学家们，一直在利用这种“武器”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妄想使这些国家“和平演变”，蜕化变质。

资产阶级分子完全懂得：在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被打倒的资本主义的腐烂的臭气，还会从各方面包围新鲜的、年轻的、生气勃勃的社会主义；只要一有机会，幽灵似的旧思想又会在有些人的头脑中滋长起来。天主教神学家雅谷·马利坦就曾经这样说过，老的一套教育，旧社会的习惯势力，以

^① 见《普世教会评论》1962年10月号，第13页。

^② 见英国公谊会乌尔曼在1961年布拉格基督教和平大会上讲演。



及聖誕樹、生活娛樂這樣一些老的生活方式，還在為資產階級思想的傳播提供障地，它將使各種舊思想恢復和滋長起來。他特別指望宗教在其中發揮作用。他認為，在社會主義社會內，在無產階級清掃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過程中，那些有資產階級思想的人，將利用基督教作藏身的堡壘。

他們對社會主義社會中反對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大肆誣蔑，但是，對於現代修正主義者丑化社會主義制度的叛變行為，則大加贊賞，說這是有“創造性”的“自我批評”，這樣“悔罪”就能得到上帝的“恩典”與“饒恕”。他們還乘機大作文章，把社會主義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分子的活动說成是普遍人性的反映，宣稱社會主義革命改變不了人性，企圖動搖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念。^①



西方的一些反动神学家利用基督教神学掩盖帝国主义殖民統治的罪行。他們竭力宣揚為帝國主義侵略辯護的反動歷史觀，說什麼帝國主義對亞洲、非洲、拉丁美洲進行侵略，是由於“西方人富於進取心”和“西方文明富有生命力”。在這裡，他們搬用了英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的反動理論，把資本主義說成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高峰，把“西方文明”說成是全世界從古到今，唯一具有生命力的“文明”。按照這種反動理論，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侵略沒有罪過，倒

要怪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自己“不爭氣”，“沒有進取心”。按照這種反動理論，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就注定了永遠是劣等民族、次等國家，永遠要處於“西方文明”的侵略和奴役之下。

在亞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運動空前高漲的形勢下，西方的反動神學家詭稱殖民統治是早已過去的历史陳迹，仿佛今天武裝到牙齒的帝國主義者都是些軟綿綿的羔羊，在為他們的祖先作高貴的“贖罪犧牲”。而今天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鬥爭，則被歪曲為是由於历史遺留下來“心理隔閡”和“彼此猜疑”而引起的。這樣，階級壓迫、階級剝削都不見了，只剩下殖民地人民的“心理”問題，而基督教会的历史使命，就在於使亞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不再“猜疑”西方帝國主義，轉而與它們“信任合作”。^②

為了掩飾新老殖民主義的殘酷掠奪給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廣大人民帶來的嚴重災難，帝國主義神學家們還大肆宣揚反動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美國一個天主教神學家最近援引洛克菲勒基金會一個高級人員的話說：“今日的世界長了毒瘤，這個毒瘤的細胞就是人。”他還把所謂“人口爆炸”說成是僅次於核戰爭的全球性威脅，他認為，歐洲、北

① 見《普世教會評論》1962年7月號，第507—509頁。

② 見1963年8月29日普世聖公宗大會上麥克斯·華倫演講：《教會在宗教邊疆上的使命》。



美不必担心所谓“人口爆炸”这问题，只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才构成严重局势。美国借对外“援助”残酷掠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财富，而这个神学家却把“美援”越多，剥削越残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越穷困这一事实，归罪于这些国家人口增长太快。他甚至说，“不发达国家若不经过巨大的人类灾难，就很难有希望进入现代社会”，“人类的前景是一个黑暗时代，其中充满苦难、饥荒……它将发展成为灾难，引起夺取日益减少的生存资料的战争”。^①他就是这样毫不掩饰地说明了自己对殖民地人民的刻骨仇恨，把殖民地人民看为毒瘤，看为世界灾难的根源。他还要求受尽帝国主义压榨的殖民地人民，承认自己是“多余的人”，心甘情愿饿死，心甘情愿让帝国主义任意宰割。这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神学家侈谈“人的价值”、“人的尊严”的伪善，以及他们利用反动人口论为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服务的阴谋。

西方的反动神学家特别重视利用神学来反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他们一贯宣称，“基督的救赎”是世人的唯一希望，任何民族解放、社会革命的理想都是“偶像崇拜”，都是“犯罪”和“背叛上帝”。在当前，由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革命怒火已经形成燎原之势，帝国主义神学家又改变手法，伪称他们并不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只是反对武装斗争、反对流血牺牲。他们宣扬非暴力主义，鼓吹“爱仇敌”和“以爱去征服敌人”。他

们竭力向殖民地人民输出唯爱主义，仿佛这是他们拳拳服膺的基督教真理。但是，在美国的一些神学院习用的《基督教伦理学原理》教科书里，却援引圣经旧约说：“上帝就是一个战争之神。战争之得以发动是由于上帝的命令，战争成就了上帝对世界的旨意。……战争将要继续到时代的终结。”^②显然，圣经如同一个杂货摊和垃圾堆，帝国主义需要什么货色，它的神学家就从圣经中拿出什么货色来。帝国主义有任何政策上的需要，神学家都可以从这个垃圾堆里拣出一点破烂，加以粉饰，把它装扮成“绝对永恒的真理”，作为基督教的信仰来欺骗人民。

帝国主义神学家特别向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鼓吹“世界主义”，宣传“超国家”思想，根本否定国家独立主权原则。他们宣称，国家不是主权者，甚至人民也不是主权者，只有上帝才是主权者。美国新教神学教授白斯特认为，人的生存，重要的是他与创造主上帝的关系，民族国家是无意义的，世界的区域性组织也无意义，基督教应当训练人从“世界角度”来想问题；尤其今天，既然要谈裁军、谈和平，更必须放弃民族国家观念。^③这种否认国家独立主权原

① 约翰·欧勃莱恩：《人口爆炸要求全世界采取行动》，1964年1月8日《基督教世纪》，第43—46页。

② 阿尔伯·纽德逊：《基督教伦理学原理》，1943年纽约版，第51—52页。

③ 白斯特：《幻想的彼岸》，1964年1月8日《基督教世纪》，第41页。



則的論調，只不过是為美帝國主義侵略和顛覆別國的罪惡活動作掩護，企圖取消民族解放鬥爭。雖然也有一些反動的神學家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日益覺醒的情況下，被迫改換手法，說什麼這些地區的人民也可以接受和使用若干民族傳統，但重要的是通過基督教接受所謂“西方文明的真髓”。顯然，他們的這種做法，也只是為他們所鼓吹的“世界主義”披上一件民族化的外衣而已。

帝國主義利用神學掩蓋它的殖民統治罪行，反對各國人民武裝革命，鼓吹美帝國主義統治下的“世界一體化”，這三項任務，經一個美國神學家概括成如下的所謂“傳教神學”口號：“普世的上帝、普遍的人性和普世一體化”。它的實質就是帝國主義的反動歷史觀、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世界主義”。這便是今天西方基督教領導人所鼓吹的“傳教使命”。

帝國主義為了進一步散播這些反動思想，正在不斷總結利用基督教從事反動活動的經驗。在這方面，西方教會中的反動政客提出：教會要吸取歷史經驗教訓，不要再企圖從上面控制一切，而要參預一切，由下面去施加影響。他們說，“過去教會往往力圖控制各種世俗事務，結果引起人們對教會統治的反叛”；“要使時間倒退，再重建宗教的至高地位是毫無希望的；即使能夠作到那樣，也是錯誤的。我們應該從歷史中吸取教訓”。他們認為，“今天的教會應該比中世紀教會

謙卑，而同時又抱有更大的雄心”。^①

但是，這些神學家與政客的反動本質，注定了他們不可能真正吸取歷史教訓。歷史事實告訴人們：自從資產階級革命打倒了中世紀的封建神權統治以來，中世紀神學那種不可一世的地位也早已消失了。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和科學社會主義的誕生，工人階級終於找到了歷史變革的秘密，並且從自己身上找到推動歷史前進的力量。今天，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光芒已經照遍全世界。基督教與它的神學無論怎樣改換新裝，再也無法像過去那樣施展它的騙術了。

一百二十多年前，馬克思就曾經指出：“宗教本身是無內容的，它不是靠天國，而是靠人間生活，而且隨着顛倒的現實（其理論便是宗教）的解体而會自行沒落的。”^②

西方基督教神學家們按照帝國主義的需要，不斷地老戲新唱，時而合十望天，時而頓足捶胸，時而輕聲細語，時而痛哭流涕，儼然以悲天憫人的救世主自居。但是，隨着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的被揭露，西方基督教神學的反動本質也正在日益被人們認清。世界人民總是愛革命的，無論西方神學家們玩弄什麼樣的花招，也挽救不了帝國主義死亡的命運，他們自己也必將隨着帝國主義的死亡走向他們的“天地末日”。

① 見1963年8月29日普世聖公宗大會上約翰·勞倫斯演講：《教會在文化邊疆上的使命》。

② 1842年9月30日致魯格的信。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論宗教》，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頁。

